

关于构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 俞良早教授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定义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特别是他们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均提出和形成了关于东方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学说。

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有关著作中论述了地处东方的俄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举行之前，列宁为大会准备了一系列文件，如《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土地问题提纲初稿》、《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等等。在大会上，列宁作了几个报告，如《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等等。从上述文件和报告的内容看，列宁的东方社会发展学说已经产生。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形成和提出了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不仅是一个新的学术概念，而且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如同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一样。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新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研究对象是俄、中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规律。

上面我简要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不同的时期形成和提出了这一学说。如果深入地研究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则可以发现他们已经揭示出东方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规律：

第一，东方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走不同于西方的路，或者说“走自己的路”。第二，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三，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努力建设先进文化。第四，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逐步地、不断地推进民主制度建设。第五，东方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第六，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善于处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三、创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意义

提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推动此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意义极为重大：

第一，它有利于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遗产。第二，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思想理论上的支持。第三，它有利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世思想史背景

宋俭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维度。本文所探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世思想史背景，是指中国近世学术思想史上的传统或者特点。将外来文化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的一大特点，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外来思想理论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的一个光辉典范。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应忽视这一大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史背景。

由于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思想史上的强势地位，自古以来，“以夏变夷”便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传统，“以夏变夷”，不仅是一个民族史概念，也是一个思想史概念。作为思想史话语的“以夏变夷”，其核心内容就是以中国思想文化去解读、同化外来思想文化。这实际就是在中国文化强势背景下的使外来思想文化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最典型的思想史案例如佛教的中国化。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强势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并逐渐丧失强势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所谓“夷夏之防”、“以夏变夷”的思想开始受到批判与怀疑，而“师夷智”、“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找真理”（实际就是“以夷变夏”），则成为近世思想史的一大主流价值取向。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特点经历了由“以夏变夷”到“以夷变夏”的目标模式和价值的转换，但在方法论上，在这个价值转换过程中，或者说，在整个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将外来思想文化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始终是近世思想史的一大特点。而近世中国思想史的这一方法论特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首先的反应也是应将其本土化、民族化。如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已经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的思想主张，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领悟。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李达很早就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1923年，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认为不能离开中国国情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其后，在1929年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他又明确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必须“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的思想。

有学者据此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实际地运用它来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从党成立起，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观点并不错，但其实这不过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外来思想文化时的一种正常的反应罢了。这正是近世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史为背景的。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尤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不可忽视这一思想史背景，尤其不可忽视这一思想史背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极深刻的影响。

关于马克思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思考

叶启绩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1月写的一篇国际述评中谈到：“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¹ 马克思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在分析其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具有相同性角度提出来的。3年后马克思又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²，虽然他在这里所讲的中国革命多半还是指民族民主革命，但它对欧洲影响将是巨大的。从上可知，马克思认为不管东方社会在走向世界历史的道路上面临着多么复杂的局面，而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进：闭关自守的帝国终将瓦解，只有通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对中国这一东方国家来说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这又从“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实现道路方面，说明了其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的差别性。

1859年，马克思提出了作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亚细亚”³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到19世纪70年代，他改变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原来含义，给予其新的内涵，用它来概括东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状况。马克思认为：原始公社解体后，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并行发展，东方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质，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因此这一新的内涵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俄国的土地公有制“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⁴，以开辟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因此在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条件下，落后民族可以实现某种跳跃式发展，一切取决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国情。这样马克思就把东、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加以区分，承认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对于马克思视野中的东方国家来说，中国与俄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有很大的不同，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到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逻辑的一致性：必须充分地吸收当今世界发达的文明，来实现社会主义，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创造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与道路。

1《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一）》（1850年1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

2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页。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4马克思《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1881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67页。

论马克思人学思想对东方社会的影响

——以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本思路的形成视角

李辉

马克思人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在西学东渐的漫漫历程中，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也渐次地影响到了东方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探寻了“人是什么”和“人怎么样”两个人学的核心话题。从人的自由自觉这个预设前提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人的异化，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出发，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中，透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怎么样”的问题，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和这一现代性境遇中人的历史性生成。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渐次走过了以政治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以农业文明为历史基础的东方社会寻求现代化之路所思考的民权、民生、民主的相契合。

其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影响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的功能定位。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也就是说，人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关系的存在。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关系。这个论断改变了中国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形成了以阶级为标准的社会分层理论和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发展动力观。

其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的价值定位。马克思从承认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即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自有个性的全面发展。在他的语境中，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所指，也是评价社会发展的标准之一。从社会发展的目标来看，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表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从社会的评价标准来看，一定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通过该社会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表现出来。因此，他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和自由个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区分社会形态。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进程也导致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持久性。而现代化中的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力量，又使得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不断增强，出现了物本取向、器本取向等片面发展表现。这样，社会发展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社会进步中得到确认，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就是对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

钟明华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迅速摆脱了近代以来的落后、困顿的面貌，摆脱了建国后“左倾路线”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封闭的局面，走向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结果。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人类文明的提升，是要让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的思想理论、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和发展道路，它包含着远大的社会理想与脚踏实地的不断推进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性两大内容，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特色和价值内涵有以下方面：

首先，在社会形态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

其次，在经济形态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第三，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需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鼓励一部份人通过诚实劳动多做贡献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

第四，在发展道路方面：实行扩大内需和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一体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统筹城乡，合理布局；以大带小，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第五，在民主政治方面：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第六，在治国方略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同步进行，物质精神两手硬，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经济基础改革与上层建筑改革相结合，发展经济与打击犯罪结合，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相结合。

第七，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发展进程中，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创新精神进行党的建设。主要是进行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体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产物，它既是相对于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而言的，是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物；同时又是在全球化时代，面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的挑战中而形成的，是一种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

从全球化视角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

王永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又面向经济全球化及和平发展的时代特征而进行的伟大历史性创造。这一创造，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就是东方落后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典范。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全球化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发展的互动性和价值的契合性。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启有着紧密的联系。由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而带来深刻变化的当代世界大势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背景。正是在与世界发展进程的全面比较中，正是在科学分析各国发展经验教训中，正是在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当代中国探索出了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独特发展道路。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而开创的崭新发展道路。

任何科学真理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时代需要和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在回应经济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创立和不断发展的。改革开放 30 年的实践证明，理论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是面对全球化挑战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面思想理论旗帜；实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人类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当代社会主义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成功范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面思想旗帜。

总之，如果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就时代背景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开辟的；就理论坐标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认识的升华和飞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旗帜；就实践方位和时代价值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人类全球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全球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与中国人的自我实现

余双好

自我实现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概念，意思是指人的潜能、价值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没有进入到中国之前，传统中国人的自我实现方式主要是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达到“内圣外王”的目的，实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我实现状态；鸦片战争打破了传统中国人的人生设计，中国近现代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新的自我实现的路径和方式。但是，中国近现代的仁人志士在寻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都走过了一条相似的发展轨迹，即从中国传统自我实现的理论和方式出发，经过对传统文化的背离，寻求西方自我实现的实现之道，最后又退回到传统自我实现的框架，从本质上并没有实现对中国传统的自我实现方式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使中国人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良方，而且找到了不同于中国传统自我实现方式的自我实现之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既与中国传统自我实现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同时又超越了中国传统自我实现和西方自我实现的局限性：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把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体现了对自我发展的重视，对中国传统自我实现理论实现了超越，挖掘了人性发展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把个人发展与人类整体发展联系起来，注重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实现了对西方自我实现理论的超越。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为人民群众指出了通过当前发展来实现未来长远发展的科学路径，为人民群众实现自我价值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途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使得中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且塑造了一批理想远大、信念坚定而又注重现实、关注民生的共产党人，正是这批在马克思主义武装下的共产党人成了支撑中华民族发展的脊梁，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发展作为发展的基础，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基本要求，把个体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作为发展的目标，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既是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创新理论，也可以作为指导人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自我实现理论，势必改变当代中国人自我实现的方式和路径，促进当代人中国的以科学发展方式实现自我潜能和价值。